

「群學」探源

—《荀學新論》的四個維度

■ 周亞平、李 夢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荀學新論》新在哪裡呢？它不止新在思想觀念，而且新在學科創新、理論建構。儒家文化生生不息，他不僅給我們提供了古老的智慧，而且還能夠不斷發展出新的篇章。牟先生在《荀學新論》一書中，第一次提出荀子是中國第一位社會學家，將中國社會學的建立提前了兩千多年，有助於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建設和發展，這一觀點已經不再是在以西釋中，更是在挖掘我們自己的「源頭活水」；這種方法，在文明的對話中，是根植於傳統，以平等的姿態，促使儒學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現

摘要：《荀學新論》是牟鍾鏗所作，是荀學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該書對荀學進行分析、評述，回顧了荀學的歷史，提煉出荀子的群學十項要義，並進而探討新荀學。作者從「角度」、「高度」、「廣度」和「溫度」四個方面構築起了荀學研究的圖景，堪稱名家寫小書的典範，帶領我們走進荀學研究的新視界。

關鍵詞：《荀學新論》；荀子；荀學研究

代。從根本上為我們培育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荀學新論》一書對荀學進行分析、評述，回顧了荀學的歷史，提煉出荀子的群學十項要義，並進而探討新荀學的新結構，在「新荀學與新經學」一節中還提出了中華新的核心經典「六典五經」說和「九典五經」說以及新經學若干構想^[1]。作者沉潛傳統文化四十餘年，關注荀子研究三十餘年，苦讀《荀子》三十二篇，從社會學的角度重新考察荀學及其當代價值^[2]，其新作《荀學新論》給我們重讀《荀子》、研究荀學和中國社會思想史提供了新視界。

作者是國內少有的從社會學角度系統地進行荀子研究的哲學家，《荀學新論》一書是荀學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這本書中，作者從「角度」、「高度」、「廣度」和「溫度」四個方面共同塑造並展現了荀學研究的新視界。

一、「角度」： 從社會學視角出發， 構建荀學研究 新思路

荀學研究不是簡單地對經典進行閱讀、解注，而是在準確理解的基礎上讀出新意，創造性地轉化為促進學科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研究成果。《荀學新論》一書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認為荀子首創了中國社會學，總結性地

提出了荀子社會學要義，構建了荀學研究的新思路，為荀學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社會學的視角貫穿於本書每個章節之中，為荀學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荀學的歷史一章中，作者對荀學的思想來源、歷史背景、發展歷程和社會影響進行了梳理，在與諸子百家思想的比較中客觀地總結了荀子思想的歷史貢獻與研究價值，展現出了荀學發展的社會軌跡。在荀子群學（即今之社會學）要義一章中，作者認為荀子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山祖，總結性地提出了十條荀子社會學要義，並展開了具體的講述，給荀子的社會思想研究提供了扎實的研究資料。在新荀學探討一章中，作者將荀子的社會學思想與現代的社會學觀點進行了部分對應，同時將荀學研究與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荀子智慧。社會學研究中比較的研究視角、客觀的研究立場、經世致用的作風都在本書的敘述中得到了展現，為荀學研究的社會學色彩加上了濃厚一筆。

通過對荀子思想的梳理和與其他思想家的比較，作者認為，荀子首創了中國社會學，荀子是中國最早的社會學家。其依據是荀子對當今社會學的很多命題都進行過探討，他指出，「在中國思想史上，以社會群體為基點構建自己理論體系並提煉出核心理念『群』的只有荀子一家，這其實就是古代的社會學，中國的社會學源於荀子，荀子是社會學的開山祖」^[3]。「荀子是中國最早的社會學家」這一命題在學界有諸多認同，英國功能主義大師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清末民初的康有為、梁啟超、嚴復以及後來的潘光旦、費孝通等都肯定過戰國末期荀子創立的群學就是中國古已有之的社會學^[4]。景天魁通過對學科標準及其前提性假設的辨析，論證了群學之為中國社會學的事實根據；通過梳理群學概念體系，證明了中國社會學的歷史存在性和綿延性，進而探尋中國社會學的歷史基礎^[5]。宋國愷也指出，荀子創造性地提出「群」的概念，「群」具有社會性、組織性和共生性，群的要旨是「合群」「能群」「善群」和「樂群」，對社會規範的形成、個體行為的約束和社會關係的協調都具有重要作用^[6]。「誰是中國最早的社會學家」這

個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經典命題容易被忽視和回避，學界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部分討論，但忽視者居多。在這本書中，作者回答了這個經典命題，並给出了一定的依據與解釋，為我們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提供了新的參考資料與思考路徑，也為中國社會學的學術自信注入了一份力量。

通過對荀子社會學思想的系統化梳理，作者在《荀學新論》的第二章中系統地總結並提出了荀子社會學的十條要義，分別是明分使群論、隆禮重法論、天人之分論、人性趨惡論、君舟民水論、尚賢使能論、愛國富民論、君子守德論、勸學修身論和神道化俗論，而「群」是荀子思想的重要起點和思考脈絡。正如景天魁所講，荀子以合群、能群、善群、樂群為主線，在修身（合群）、齊家（能群）、治國（善群）、平天下（樂群）四個層次上展開了群學命題體系的「一線四層」基本格局，命題體系的演進邏輯是整合——貫通的邏輯^[7]。也有研究指出，「明分使群」這個命題解釋了社會秩序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同時又提出「隆禮重法」作為社會整合的具體形式^[8]，這總結性地概括了明分使群論和隆禮重法論之間的關係，也幫助解釋了荀子社會學要義之間的關係框架。荀子的社會化思想源於其對於人性的認識，「性偽之分」是荀子人性理論的基礎^[9]，勸學修身論是道德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君子守德論是道德社會化的結果，這反映出了荀子思想之間的關聯性。這十項要義互相關聯構成了荀學的整體框架，荀子社會學要義包含了荀子和作者對社會的理解，也滲透出了他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情懷與抱負。在對荀子社會學要義的講解與敘述中，作者多採用經典、原著進行論證，並與其他思想家的思想進行比較，探究其思想來源、思想內涵與後續傳承，力圖完整、清晰地描繪出荀子的社會學想像和智慧結晶，給我們展現出了荀子思辨的智聖形象和務實的社會學家形象，同時，又給了解和研究荀子社會學思想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總結性地提出荀子社會學十條要義之後，作者提出了構建新荀學的設想。他提倡指導思想的返本開新、繼承和發揚當代新儒家「闡舊邦以輔新命」的綜合創新精神和儒家核心經典系統的

調整^[10]。他認為，五經不變，四書可以增加為六典，分別為《論語》、《孟子》、《荀子》、《禮記》、《孝經》和《史記》，他解釋道，《禮記》中不只有《大學》和《中庸》重要，其他幾乎篇篇皆是精品，不讀不足以了解禮文化的深厚積蘊^[11]；《孝經》論孝，大大提升了孝的層次，不讀《孝經》難以透徹了解禮儀文明的發展^[12]；《史記》也是一部集歷史思想文學於一身的偉大作品和世界名著^[13]。如果將視野擴及於中華文化中心地帶的儒道佛三教，則中華核心經典可增至為「九典」，即《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荀子》、《禮記》、《孝經》、《史記》和《壇經》^[14]。繼而解釋道，《老子》，又稱《道德經》，五千言，是道文化的第一經典，以哲理詩的方式展現貴柔的大智慧^[15]；《莊子》也稱為《南華真經》，以藝術手法，用大量寓言故事表達一種心在物外的灑脫哲學，行文汪洋恣肆、恢詭譎奇，讀之可使人從實用人生提升到審美人生^[16]；《壇經》是中國佛教作品中為以稱之為「經」的典籍，記載禪宗六祖慧能的言行，吸收了儒家重現實、重人倫的入世精神，又借重於道家微妙玄通、見素抱樸的超越意識，使禪宗在深層次上融入中華固有文化^[17]。不論六典還是九典，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對中華經典的崇敬和龐大的學術野心，對中華經典文化的學術自信與熱忱。

總的來講，《荀學新論》一書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為荀學研究和荀學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二、「高度」：從《荀子》經典出發，重新考察荀學及其當代價值

真正的大家和經典回應了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大問題，是理論化、系統化的，而非零散的，對後世的理論創新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社會科學研究回歸大家和經典有助於把握學科發展的方向和脈搏，也有助於增強研究的基礎。作者沉潛傳統文化四十餘年，關注荀子研究三十餘年，苦讀《荀子》三十二篇，從智聖荀子和經典《荀子》出發，重新考察荀學及其當代價值，增添了荀學研究的「高度」。

荀子是智者型聖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綜合諸子而側重於禮治之道，以禮主法輔論

發展了孔子禮學，對後世禮儀之邦的制度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18]。從荀子的胸懷和品格來看，他講四海如一家，有高尚的品格、超人的智慧，不慕權貴、實事求是^[19]，這也使他的思想具有極強的綜合性和包容性，關注現實問題，具有現實主義風格。從荀子對儒學的貢獻而言，他最大的貢獻在於使禮文化系統化、理論化，從而促成了禮經的形成與禮制的建設，為中華禮儀之邦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20]，作者將荀子與儒學和禮文化結合了起來，突出強調了荀子對禮文化的重要貢獻。從荀子與諸子百家的關係來看，不僅是否定批判性的，也是吸收綜合性的，在批判的同時加以綜合創新，集先秦百家之大成^[21]，這說明了荀子思想的綜合性與先進性。從荀子與社會學的關係來看，荀子是中國最早的社會學家，他對當今社會學的很多命題都進行過探討，首創了中國社會學，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山祖。從荀子的社會影響力而言，荀子的思想具體而講求實際，社會影響力實重名輕，作者認為荀子推動禮儀文化之智慧與功績超出了孔孟，現今應據實稱為「智聖」^[22]，給予了荀子極高的社會評價。從荀子與中華禮儀之邦的關係看，荀子及其弟子與後學，對於古典禮經的詮釋和禮儀文化的多層面、多角度的闡揚，對於中華禮儀之邦的形成有重大作用^[23]。總的來講，荀子是中國重要的思想家、社會學家，其思想具有深厚的學術研究價值和強烈的現實意義。

從經典《荀子》來看，《荀子》一書，現存共三十二篇，是先秦學者荀子思想的集中展現，《荀子》一書中包含著群學的元典形態^[24]，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寶庫。從學問的具體觀點來看，作者苦讀《荀子》三十二篇，總結出明分使群論、隆禮重法論、天人之分論、人性趨惡論、君舟民水論、尚賢使能論、愛國富民論、君子守德論、勸學修身論和神道化俗論十項荀子社會學要義。從所引所記先秦經典而言，所引先秦經典在許多方面超過孔孟，對流傳下來的四書五經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荀子》一書引證《詩經》八十餘處，都是作為價值導航使用的；引用的先秦典籍中有很多逸書，非常珍貴^[25]。從《荀子》的文風來看，宏富正大而又切合實用，論證嚴密，講究推理，極富說明力，這顯著

增強了荀學的系統性和層次性，前因後果極其分明，^[26]也為我們閱讀《荀子》、研究荀學提供了便利。從《荀子》給後世提供的智慧來看，可以為社會和諧、共同富裕、當代法治、教育改革和宗教事務管理等提供重要啟示；也可以作為今日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資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大智慧，幫助人類克服冷戰思維^[27]。經典《荀子》是荀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對於了解荀子、進行荀學研究的意義是基礎性的，值得荀學研究者苦讀、深入研究。

《荀學新論》一書，從荀學的歷史開始引入，與孔子、孟子的思想相比較，與諸子百家相關聯，有助於把握荀學思想的歷史定位，增添了理解的深度；從儒學大家荀子的思想出發，多引用《荀子》的原文，從原文的角度去理解、去把握、去闡釋，提升了研究的起點；從社會學的角度對荀子的思想加以分類和總結，有助於系統化、體系化地把握和理解荀學，增添荀學研究的體系化程度；將荀學與現代化建設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發展、古為今用，增加了荀學研究的現實度。總的來講，作者的《荀學新論》一書，從大家和經典出發，結合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實際，重新考察荀學及其當代價值，增添了研究的「高度」。

三、「廣度」：跨越時空距離， 縱橫古今，融匯中西

《荀學新論》一書跨越了簡單的荀子研究，將荀學放置在中華文化的大框架中去理解、去探討，對荀學的思想來源、具體內容和後續傳承都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跨越了時空的距離和限制，具備社會學的想像力和洞察力。

《荀學新論》一書將荀學放置在中華文化的大框架中去研究，將荀子與孔子、孟子進行比較，呈現出了荀子的智慧與功績和荀學的歷史貢獻；用荀子與諸子百家的否定批判性和吸收性合性關係，來說明荀子集百家之大成；將荀子與中華禮儀之邦聯繫起來，說明荀學對禮文化、中華禮儀之邦形成的重要作用；將中華文化核心經典的「四書五經」擴展為「六典五經」和「九典五經」，強調了《荀子》及其他經典的價值；將荀學對《呂氏春

秋》《淮南子》等經典的寫作具有重要作用，對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學說的形成具有支撐作用，對唐太宗的用賢和納諫、關懷民生和教育等政治實踐具有重要影響。可以發現，《荀學新論》一書擺脫了就荀子研究荀學的限制，將荀學研究放置於更廣闊的天地裡探討，避免了「故步自封」，具有寬廣的視野和極強的包容性。

從時間的角度來看，《荀學新論》一書涉及到了先秦及其之後的諸多時代，縱橫古今。荀學處於先秦，其重要思想來源孔、孟等諸子百家也屬於先秦，但荀學的影響則涉及到了先秦及其之後的諸多時代，比如秦漢、唐宋、明清以及近現代等諸多時期，就君子守德論一條就影響了中華道德傳統兩千餘年。就學術研究方面而言，荀學研究出現了復興的趨勢，學術研討日漸活躍，諸多荀學研究成果噴湧而出，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就今日的社會價值而言，荀學對社會管理學、職業分工與社會和諧、共同富裕、當代法治、教育改革、新宗教事務、道德中國和和諧世界建設等都具有諸多參考意義。荀子思想體現了儒學在變革時代堅持理想、與時俱進的品質，展現出理想性與實踐性的有機統一^[28]，這大概也是其縱橫古今的重要原因。可以發現，荀學的影響不僅停留在先秦，而是縱橫古今諸多時代，正如景天魁所講，群學具有歷史綿延性，它並沒有伴隨荀學在一個歷史時期的「式微」而消匿，而是以潛入民間、深入日常生活、構成社會生活行為規範的形式而繼續綿延^[29]，具有普遍性的永恆價值。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荀學新論》一書將荀學思想與國外思想相比較，將荀學的社會價值擴展至整個世界，融匯中西。文中用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綱》、《哥達綱領批判》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重要思想來說明荀學中群學、愛民富民的重要價值，增加了中西經典和思想的對話，也說明了文明之間的相通性。在具體的應用方面，荀子的溫和無神論思想對整個世界的宗教事務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荀子的君舟民水論對整個世界政治體制都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等，這彰顯出了荀學具有的普世價值。荀學思想的影響也不只是中國，而是世界，只以中國

哲學的方向進行荀學研究的總結和反思始終是有所限制、不夠格局的。融匯中西，著眼世界，方顯世間研究大道。

社會學的想像力是一種心智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我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我們可以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全貌^[30]。這種心智品質包括了三種能力，宏觀結構與個體經歷之間的貫通力、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歷史穿透力和對社會轉型的洞察力。《荀學新論》一書的寫作過程中，作者並未將荀學研究局限於先秦，而是將其放置在整個中華文化的脈絡中去考察，並對荀學的後續傳承做出了重要的描述，展現出了其深厚的歷史穿透力和對社會轉型的洞察力，也滲透出了作者對荀學思想的深厚理解和對中華文化的獨特洞察力。社會學的想像力也貫穿於作者的研究和成果的書寫之中，其對中國社會結構和個體發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都有著深厚的理解與感悟。

總的來講，《荀學新論》一書跨越了時空的距離，縱橫古今，融匯中西，具備社會學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增添了荀學研究的「廣度」。

四、「溫度」：在書本與社會中穿行，極具人文社會關懷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服務對象也是社會，研究成果不是放置於書齋樓閣，而是成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作者在書本與社會中穿行，極具人文社會關懷，增添了社會學的想像力，更增添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溫度」。

作者的荀學研究不是只對荀學進行解讀或者闡釋，而是提出了他自己的觀點，他的觀點帶著強烈的人文社會關懷。他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學應當稱為「人本的民主的社會管理學」，具有以下三種特色：以民為本，既不同於君主制時代的「君主民從」，也不同於資本主義時代的「富主貧從」，而是真正的「民主官從」；處理好政治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管理不同領域和層次上，必須由君子群體起主導作用^[31]。他依據孔孟荀的君子之說，提出了君子人格「六有」論，即「有

仁義、立人之基」、「有涵養，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擴人之胸」、「有坦誠，存人之道」和「有擔當，盡人之責」^[32]，強調了君子道德的重要性，也飽含了他對當代君子的諸多期許。他將荀子的民生、富民思想與共同富裕結合起來，指出共同富裕不等於富裕的程度一致，認為富裕程度必然有等差，強調共同富裕與合理等差並行^[33]，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他的新經學構想將「四書五經」擴增至「六典五經」和「九典五經」，跨越了儒家經學的一般思考範圍，將儒、道、佛更好地融入，體現出了作者極強的學術包容性，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獨特的包容性。特別是在面對宗教文化時，牟先生從思想史的角度，反思了「戰鬥的無神論」產生的歷史背景，並根據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提出了「溫和的無神論」，來回應「戰鬥的無神論」。這不僅對當代宗教工作的管理具有現實意義，還具有更加深厚、更加普遍的理論意義。當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新發展「宗教中國化」，就是以「溫和的對話」來代替「對抗與戰鬥」，在多元通和之中，積極引導各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可以說，「溫和的無神論」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精神核心，「多元通和」、「修己安人」是真正落實宗教工作會議精神的具體方法、精神氣質，是在宗教事務管理中為人處世的基本態度。從中，我們能夠感受到牟先生學術研究中濃濃的人文主義情懷，「修己以安人」境界與溫度。此外，書中關於建議的部分也大多採用「參考」的前綴，不說「應該如何」，而是展現出可能的路徑，這表現出了作者嚴謹的態度，也展現出了學者求真務實的作風。

作者研究荀學、中國哲學，但並沒有拘泥於對傳統意義上哲學的研究，而是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荀學及其當代價值。一個學科的話語體系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歷史積累的時間越長，話語體系越豐富、越成熟^[34]，作者將荀子作為社會學的開山祖、中國社會學第一人對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而社會學的角度也為研究增添了更多社會性與現實感。本書將近二分之一的內容都是結合我國社會發展

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而談，書中關於社會管理學、當代法治、共同富裕、宗教事務管理、教育改革甚至是新荀學、新經學的想法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與實踐價值，古為今用、對傳統文化做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思想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同時，這些結合現代化發展實際的想法也包含著作者對中國發展的想像，更是一個學者愛國情懷、學術情懷的真實呈現。

身處社會，立足於社會，把握經典，而又不拘泥於書本。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荀子的景仰、對荀學研究的人情和對學術研究的熱愛；也可以感受到那份學者的「書卷氣」和身處於社會的「煙火氣」。換言之，不拘泥於書本，關懷社會，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需要「溫度」。

五、結語

「思想的活動，最初表現為歷史的事實、過去的東西，並且好像是在我們的現實之外。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於我們有歷史，或者說的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裡，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在的、那個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35]《荀學新論》一書在「角度」、「高度」、「廣度」與「溫度」四個層面構築起了一幅荀學研究的圖景，增進了我們對荀子、荀學以及儒學的認識和了解，也對荀學研究以及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諸多助益。

《荀學新論》一書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行文之中也帶有一些社會學的概念和色彩。從社會學的想像力角度看，社會學想像力是一種心智品質，基本內涵是微觀事實與宏觀結構之間的貫通能力，即一種穿透個體經驗與社會結構的能力^[36]，《荀學新論》顯然沒有觸及到社會結構，但是我們不可否認其仍是荀學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積極有益嘗試。從行文角度來看，本書更像是荀學的哲學研究，而非社會學研究或者說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其研究的思路依舊是遵循哲學的研究路徑，這與作者所受到的哲學學術訓練有關。

思想史是可以不斷地追問、詮釋和書寫的，

聶錦芳在讀宋榮培著的《中國社會思想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其研究問題時堅持自覺的比較視角和跨文化眼光^[37]，《荀學新論》一書在書寫的過程中，作者也帶有自覺的比較視角，這是值得稱讚的。社會學中關於荀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之中，王處輝、陳定閔、謝遐齡、吳根友、龐紹堂和季芳桐、楊善民等在他們各自所著的《中國社會思想史》或類似著作中都對荀學有專門論述，各有洞見^[38]，但以整本書從社會學角度呈現荀學研究的當屬這本《荀學新論》。從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該書提供了思想家社會思想梳理與書寫的新思路，有助於豐富和發展中國社會思想史。

總而言之，《荀學新論》是一本極富研究意義的書。該書值得荀學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者深入閱讀，是名家寫小書的典範。

[1] 牟鍾鑒：《荀學新論》（北京：商務出版社，2021年），第4頁。

[2] 同上，第3、4頁。

[3] 同注[1]，第45頁。

[4]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學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2012年），第3頁。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17頁。費孝通：《從實求知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32頁。景天魁：〈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歷史基礎〉，載《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景天魁：〈欲興其學先正其史——略談中國社會學史研究〉，載《人文雜誌》，2019年第6期。

[5] 景天魁：〈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歷史基礎〉，載《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6] 宋國愷：〈群學：荀子的開創性貢獻及對其精義的闡釋〉，載《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7] 景天魁：〈論群學元典(1)—探尋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第一個版本〉，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6期。

[8] 李驚雷：〈略論荀子的社會秩序論思想〉，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9] 萬江紅、狄金華：〈荀子社會化思想與西方社會化理論的比較分析〉，載《武漢大學學報》（人



- 文科學版)，2005年第3期。
- [10]同注[1]，第219-222頁。
- [11]同注[1]，第224-225頁。
- [12]同注[1]，第227頁。
- [13]同注[1]，第228頁。
- [14]同注[1]，第235-238頁。
- [15]同注[1]，第236頁。
- [16]同注[1]，第236-237頁。
- [17]同注[1]，第237-238頁。
- [18]同注[1]，第1、15頁。
- [19]同注[1]，第219頁。
- [20]同注[1]，第8-9頁。
- [21]同注[1]，第21、28頁。
- [22]同注[1]，第14-15頁。
- [23]同注[1]，第36頁。
- [24]同注[7]。
- [25]同注[1]，第201-207頁。
- [26]同注[1]，第219頁。
- [27]同注[1]，第219頁。
- [28]施凱文、梁濤：〈荀子思想新論綱〉，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 [29]景天魁：〈史海拾貝：中國社會學概念體系的歷史資源〉，載《社會學評論》，2017年第5期。
- [30][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 [31]同注[1]，第144-145頁。
- [32]同注[1]，第147-167頁。

- [33]同注[1]，第170-173頁。
- [34]景天魁：〈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歷史路徑〉，載《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 [35]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卷第7-8頁。
- [36][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頁。
- [37]聶錦芳：〈不斷書寫的中國思想史—韓國學者宋榮培著《中國社會思想史》讀後〉，載《哲學動態》，2004年第9期。
- [38]景天魁：〈論群學復興—從嚴復「心結」說起〉，載《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5期。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Sociology in China --Four Dimensions in "Xun Xue Xin Lun"

Zhou Yaping, Li Meng(Lan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Abstract: "Xun Xue Xin Lun", written by Mou Zhongjian, is the latest monograph on the study of Hsun-Tzu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 thought.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reviews the history of Xunology, extracts the ten essential points of Hsun-Tzu's sociology study, and then proposes a new study of Xunology. In addition, the autho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Xunology research from four aspect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model for well-known scholars to write small books, leading us into a new horizon of Xu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Xun Xue Xin Lun", Hsun-Tzu, Xunology research